

从孔子的经济思想看他的反动政治立场

经济系 靳 实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大变革时期。那时，旧的生产关系已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奴隶制由封建制来代替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生当此时的孔子，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拚命地维护正在崩溃中的奴隶制和奴隶主阶级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他提出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这样一个反动政治纲领，妄图把奔腾前进的历史车轮拉向后转。

孔子这种反动的政治立场，除了反映在他的哲学、政治和文化、教育等思想上以外，也必然强烈地反映在他的经济思想上。马克

思曾精辟地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资本论〉第一卷初版的序》）。马克思这一教导启示我们，在今天剖析孔子这个奴隶主阶级的“圣人”的时候，从他的经济思想方面剥开他的画皮，暴露出他“吃人”的狰狞面目，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而且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开展对于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革命大批判，使我们清楚认识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政治上反动透顶，是有其极为深刻的经济根源的。

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土地所有制，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无论在奴隶制社会或封建制社会，土地都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因此，对待所有制关系的态度，主要表现在对待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态度上。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孔子的反动立场表现得极为明显。他强烈地反对当时鲁国新兴封建势力“用田赋”的革新措施，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在商、周的奴隶制社会中，一切土地和奴隶都归最大的奴隶主贵族头子——天子所有，天子再把土地连同奴隶层层分封给他以下的诸侯、卿、大夫、士等大小奴隶主贵族，但是诸侯以下的奴隶主对这种分封的土地，没有所有权，只有享受权，所以当时叫做“公

田”。大小奴隶主迫使成千上万的奴隶到指定的田地上进行无偿劳动。到了春秋时代，随着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不断的反抗斗争和辛勤劳动，在“公田”之外又发展起来“私田”，并逐渐采取新的封建剥削方式，于是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逐步突破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关系而发展起来，新兴封建势力逐渐形成。

当时，鲁国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是季氏等三家。这三家的先世从鲁宣公时起，就与代表奴隶主反动势力的鲁公室有矛盾。有名的“初税亩”和“用田赋”，就是季氏三家当政后陆续实行的。“初税亩”发生于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五九四年），就是原来不

承认私田的“王室”和“公室”，为了摆脱困境，不得不打破公田和私田的界限而一律取税，公开承认土地私有权为合法。它标志着由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向封建制的土地所有制的转化。到了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四八四年），在鲁国当政的季康子，连军费也要改为按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量来征收，这就是“用田赋”，它进一步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革新措施，大大地触怒了孔子。季康子在决定“用田赋”之前，曾派孔子的学生冉求（这时正在季康子门下做官，并帮助季康子实行一些革新措施）去征求孔子对这件事的意见。孔子表示坚决反对，并对着冉求狠狠地指责季康子的这一革新措施违反了周朝奴隶制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孔子还威胁着说，如果季康子安分守己的话，就应当按照“周公之典”，即奴隶制的典章制度执行下去；否则，硬要搞什么“用田赋”，那就要被指斥为“苟”，即大逆不道了（《左传·哀公十一年》）。但季康子并没有被孔子这番话吓倒，到了第二年春天，果然在冉

求的帮助下，实行了新的田赋制度。为了这件事，孔子除了在他的变天账《春秋》上记下了“用田赋”三个大字，准备伺机反攻倒算外，还悍然宣布不再承认冉求是自己的学生了。他说什么：“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

早在孔子生前一百年前后，齐国也进行了同鲁国类似的改革。大夫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土地质量好坏征收贡赋的改良主张（《国语·齐语》）。这一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原有的贡物缴纳一般以俸禄等级为根据的办法，反映了当时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向封建土地所有制过渡的要求。孔子对此也不以为然，还骂管仲“不知礼”（《论语·八佾》）。

孔子拼命反对鲁、齐两国实行新的赋税制度，实质上就是反对新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建立，死抱住过了时的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不放。这完全是对春秋时代历史潮流的一种反动。

孔子坚持对奴隶的占有和剥削，反对奴隶解放

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不但占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而且完全占有生产者——奴隶。这是在生产关系上奴隶制区别于封建制的重要之点。列宁指出：“奴隶主和奴隶——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区分。前一集团不仅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即占有土地和当时还很原始的工具等等，并且还占有人。”（《论国家》）奴隶社会中的奴隶，完全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和牛马一样可以由奴隶主任意买卖和杀戮。

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随着奴隶的不断起义，以及私田的大量出现并向公田争夺劳动力，奴隶们从斗争中获得了解放，有的

则成为雇农，奴隶主完全占有奴隶的这种关系，逐渐松弛了。比如，当时齐国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田氏，采用大斗借出、小斗收进的办法，与奴隶主反动势力争夺劳动力。当时齐国有民谣说：连采野菜的女人愿意归到田氏门下。这说明田氏采取的措施严重地削弱了奴隶主反动势力，使奴隶主再不能象过去那样完全占有奴隶了。看到此种情况，孔子胆战心惊，竭力要把已经松弛了的奴隶主完全占有奴隶的这种关系重新箍得紧紧的，以挽救日趋瓦解的整个奴隶制。

首先，孔子特别强调要“正名”。这就是妄图用已经过了时的奴隶制的等级名份，去纠正当时封建势力逐渐兴起的客观现实。

孔子对奴隶主和奴隶的称谓规定得极为严格。在《论语》一书中，“民”字都是用来专指奴隶，“人”字则用来专指奴隶主或泛指奴隶以外的阶级和阶层，绝不用来指奴隶，因为在他看来，奴隶根本不是人。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其中“民”就是指奴隶，“人”就是指奴隶主。他要奴隶主谨慎从事，取得威信，节省费用，相亲相爱，这样才能更有力地役使奴隶。

孔子强调“正名”，还表现在强调奴隶主之间要各守其分，安于所得，不要你争我夺，互相兼并，也就是调整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关系。他提出：“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这就是说：各级奴隶主要加强对自己这一级占有的奴隶单位的管理，不要去侵占别人占有的奴隶，这样就能稳住整个奴隶主阶级的阵脚，使整个奴隶主占有奴隶的关系得以维持。孔子的这种“正名”思想，就是按照奴隶制的“周公之典”，把开始松弛的奴隶制占有关系重新紧箍起来。

其次，孔子极力主张奴隶主对于奴隶要“庄以莅之”。就是说，奴隶主要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架势来，否则“民不敬”，奴

隶们会造反的（《论语·卫灵公》）。孔子的学生宰我把孔子的这个意思说得更加露骨，就是要“使民战栗”（《论语·八佾》）。这就是说，要使奴隶们在奴隶主的淫威之下，一天到晚战战兢兢地过日子，不敢起来造反。如果奴隶们果然起来造反了，那就要残酷镇压。孔子听到郑国子产等人极力主张对奴隶使用严刑后，就曾经杀气腾腾地说过：“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左传·昭公二十年》）

第三，孔子还大肆叫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当时，随着奴隶逃亡等反抗斗争事件不断发生和地主阶级的兴起，出现了“礼崩乐坏”和“学术下移”的局面。孔子深怕奴隶会因此而获得文化知识，进一步觉醒起来投入争取解放的斗争，便提出了这个愚民政策。在孔子看来，奴隶只能当牛马一样驱使，绝不能得到什么知识，如果说也要让奴隶知道一点什么，那也无非是教奴隶对付奴隶主要“服”、“敬”、“忠”。（《论语·为政》）他以为这样一来，奴隶主对于奴隶的占有关系就可以维系永久了，奴隶就会永生永世俯首贴耳地接受奴隶主的统治了。孔子反对奴隶解放，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丑恶嘴脸，在这里暴露无遗。

孔子在分配上鼓吹奴隶主致富，反对新兴封建经济发展

孔子还千方百计地维护奴隶制的分配方式。面对春秋后期阶级剧烈分化，财富争夺愈演愈烈的情况，孔子一方面鼓动奴隶主在奴隶制剥削方式的范围内去追求财富，另一方面则极力抵制新兴封建地主经济势力的发展。

对于新兴封建主的致富，孔子是深恶痛绝的。例如，对前面提到的季氏不断扩张封建经济势力而“富于周公”，孔子就表示了

极大的不满（《论语·先进》）。当然，新兴封建主的致富，同样是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结果；但在孔子的时代，用封建制生产关系代替奴隶制生产关系，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为了抵制象季氏这样的新兴封建势力的发展，孔子提出了一个要大家都要安于分封的财富分配原则。

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

安无倾”（《论语·季氏》）。在这里，孔子特别强调了一个“均”字。所谓“均”，就是要奴隶主各人都得到自己应当得到的那一份土地和奴隶。“均无贫”，也就是说，只要奴隶主各人都得到并满足于自己应得的那一份土地和奴隶，而不去互相争夺，就不致于发生贫不贫的问题。孔子主张的这个“均”和他所强调的“均无贫”，其实质就在于反对新兴的封建地主势力打破奴隶制的原有财富分配关系。孔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奴隶制的经济、政治秩序，才能免于奴隶制的崩溃。

孔子还针对当时新兴封建势力与王室争夺财富的情况，提出了“贫而无怨”（《论语·宪问》）乃至“贫而乐”（《论语·学而》）的口号。这就是要新兴封建主安于“贫”，要他们安于已经占有的财富，不再去争夺王室和奴隶主阶级的土地和奴隶；要广大劳动人民安于“贫”，就是要他们满足于受剥削的地位，满足于极端贫困的生活，不要有任何抱怨。孔子认为：“好勇疾贫，乱也”（《论语·泰伯》）。新兴封建主不安于“贫”，就会进一步与王室和奴隶主贵族争夺财富；广大劳动人民痛恨剥削，更要起来革命，这样天下就会大乱，摇摇欲坠的奴隶主统治地位就更加有覆灭的危险。可见孔子的这套主张都是为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经济地位而设想的。

这个时期，随着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商品货币也有所发展。这也极大地削弱了世袭奴隶主贵族的经济特权，因此他们对于私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十分害怕。卫国一个奴隶主贵族就惊呼：“工商未尝不为患”。他们深怕新兴封建势力起来造反，夺取奴隶主贵族的财富（《左传·定公八年》）。孔子这个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也本能地感到这一发展的威胁，对举凡有助于促进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种种改革措

施，一概加以反对。例如当时鲁国的季氏等家，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准备改铸大钱，即发行币值更大的货币。孔子的学生闵子骞对这件事表示反对，说是沿用原来的币制就行了，有什么必要改革呢？孔子连忙称赞闵子骞说：此人本时不大讲话，一讲就很中肯（《论语·先进》）。对于鲁国大夫臧文仲的“废六关”，即废除关卡以利商旅的措施，孔子斥之为“不仁”，认为是臧文仲的所谓三不仁之一（《左传·文公二年》）。孔子还指责他的学生子贡经商致富是违背了天命，是“不受命而货殖”，并讥子贡“亿则屡中”，说他很会投机（《论语·先进》）。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是对奴隶制的有力冲击，是历史的进步。孔子反对这种进步，只能说明孔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

从对孔子反动经济思想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反动派为了维护和复辟旧制度，都必然要拚命维护旧的生产关系。孔子所以挖空心思地从各个方面维护崩溃中的奴隶制的所有制，正是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及其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这也正是他的反动经济思想的实质。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奴隶社会和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更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孔子这个坚持奴隶主阶级专政的顽固派，死去已有两千多年，而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恢复地主资产阶级被夺去的“天堂”，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极力鼓吹孔孟之道，宣扬一整套反动的政治纲领，（下转 105 页）

注:

- ① 苏修《新世界》一九六九年第十二期
- ②②②② 苏修《远东问题》一九七三年第二期
- ③ 《史记·商君列传》
- ④ 《荀子·儒效》
- ⑤ 《荀子·非相》
- ⑥ 《韩非子·五蠹》、《显学》
- ⑦ 《论语·述而》
- ⑧ 《礼记·中庸》
- ⑨ 《论语·八佾》
- ⑩ 《论语·阳货》
- ⑪ 《论语·雍也》
- ⑫ 《盐铁论·论儒》
- ⑬ 《史记·孟轲荀卿列传》
- ⑭ 《孟子·告子下》
- ⑮⑲ 苏修《历史问题》一九七三年第五期
- ⑯ 苏修《历史问题》一九六八年第十期
- ⑰⑳ 苏修《历史问题》一九六七年第三期
- ⑱ 《苏修历史百科全书》一九六五年俄文版
- ⑲ 《论语·颜渊》
- ㉑㉒ 《论语·为政》
- ㉑ 《论语·学而》
- ㉒ 《孟子·梁惠王下》
- ㉓ 《孟子·尽心上》
- ㉔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 ㉕㉖ 《孟子·滕文公上》
- ㉗ 苏修《文学报》一九六九年第三十四期
- ㉘ 《史记·秦始皇本纪》
- ㉙ 《荀子·坐宥》
- ㉚ 郑樵：《通志》卷71
- ㉛ 刘大槲：《海峰文钞》
- ㉜ 《汉书·董仲舒传》

(上接97页)并妄图通过反革命的武装政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同孔子一样,他的反动政治纲领,也是以他所代表的反动阶级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同样是为了维护旧的生产关系。用他们自己的黑话来说,就是让一小撮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然而,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來的。孔子没能挽救住奴隶制的最终崩溃;封建地主阶级从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后,利用孔子学说作为统治思想,也没能挽救封建王朝的最终崩溃;林彪同样阻挡不了奔腾向前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潮流。他们都只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这是历史的必然。

(原载1974年2月4日《光明日报》)